



儒家的民本思想及其当代(陈增辉)

(2005-7-15 10:20:03)

作者: 陈增辉

摘要: 儒家民本思想渊源于商周, 形成于春秋战国。进入封建社会后, 随着统治阶级与人民群众间矛盾斗争的起伏而上下波动。秦末、隋末、明末农民大起义, 促成了汉初、唐初、清初民本思想的新高涨, 迫使统治者采取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, 促进了经济文化的繁荣, 导致了文景之治、贞观之治、康乾盛世的出现。到了近代, 随着西学东渐, 传统民本思想开始向近代民主思想嬗变, 成为我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、特别是群众观点的深厚文化土壤。弘扬民本思想中的精华, 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, 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。

什么是国家的根本? 是神明? 是君王? 还是人民? 这是传统政治哲学中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。其所以如此, 是因为如何认识和处理这个问题, 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, 古今中外概莫能外。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, 围绕这个问题展开过长期的争论。随着人民力量的壮大和显现, “民为邦本”的思想慢慢替代了“神为邦本”的思想, 与“君为邦本”的思想一起, 成为政治哲学中的重要内容。经过长期的嬗变, 成为我们接受近代民主思想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, 以至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深厚文化土壤。

—

在中华民族发展的早期, 与其他民族一样, 由于人们对自然现象和自身构造的不理解, 产生了自然神论和灵魂不灭的观念, 出现了恩格斯称为“自发宗教”的原始宗教, 神明成为社会的根本。进入阶级社会后, 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, 把“自发宗教”改造成为“人为宗教”, 宣扬天帝神明决定一切的“神本论”。如甲骨文中有“帝令雨”、“帝不令雨”, “帝降食”、“帝降堇”等; 《礼记·表记》有“三代明王, 皆事天地之神明”等记载。从尧开始, 最高统治者声称自己是受命于天来统治天下的。如尧曰: “尔舜! 天之历数在尔躬。”(《论语·尧曰》。下引此书, 只注篇名) 《尚书》曰: “有夏服(受)天命”, “受天有(佑)大命。”(《召诰》) 《诗》曰: “帝立子生商。”(《商颂》) 《尚书》认为, 殷取代夏, 商汤取代夏桀都是执行“天命”: “有夏多罪, 天命殛之, ……予畏上帝, 不敢不正。”(《汤誓》) 周取代殷, 文武灭殷, 也都是按“天命”行事: “非我小国, 敢弋殷命, 惟天不畀。”(《多士》) “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, 诞受厥命, 越厥邦厥民, 惟时叙。”(《康诰》) 对于小国周取代大国殷, 周公解释道: 上天把原来授予殷的天命收回, 传授给了周, 并令文王消灭殷, 他把这叫做“唯命不于常”(同上), 《诗》又将此概括为“天命靡常”(《大雅·文王》), 天命不是永常不变的。这表明, 天命的权威下降了, 人们对天命的信仰开始动摇。此时, 统治者开始认识到, 要保住天命不转移, 不仅要靠天的庇护, 还要靠自身修德来保民。《逸周书》曰: “皇天无亲, 惟德是辅。”《诗》曰: “聿修厥德, 永言配命, 自求多福。”(《大雅·文王》) 这些说明: 神为邦本开始向君为邦本过渡了。

先秦至两汉, 君为邦本几乎成为各派思想家的共识。既然君是天帝的子孙, 又受天命行事, 那么, 他就理所当然地拥有天下的一切了。《诗》曰: “溥天之下, 莫非王土; 率土之滨, 莫非王臣。”(《小雅·北山》) 《左传》曰: “封略之内, 何非君土; 食土之毛, 谁非君臣。”(昭公七年) 《墨子》曰: “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义, 是以天下治也。”(《墨子·尚同》上。下引此书, 只注篇名) 《中庸》曰: “尊为天子, 富有四海之内。”孟子认为, 对君而言“尺地莫非其有也, 一民莫非其属也。”(《孟子·滕文公》上。下引此书, 只注篇名) 荀子曰: “上者下之本。”(《荀子·正论》。下引此书, 只注篇名) 韩非子曰: “民智之不可用, 犹婴儿之心也。……为政而期适民, 皆乱之端, 未可与为治也。”(《韩非子·显学》。下引此书, 只注篇名) 总之, 君主是“一人定国”(《大学》), “其人存, 则其政举; 其人亡, 则其政息。”(《中庸》) 这种观点, 在中国几无间断, 其消极影响直及当今。

事实上, 神为邦本与君为邦本从根本上说是相同的。肯定神为邦本, 是为了论证并强化君为邦本。如《左传》曰: “夫君, 神之主而民之望也。”(襄公十四年) 孔子说: “天子受命于天。”(《礼记·表记》) 董仲舒说:

“尧舜受命于天而王天下”，“王者承天意以从事。”（《尧舜汤武》）既然君王的权利是天授予的，民当须绝对顺从。但是，随着人民力量在实践中的不断显示，神为邦本思想和君为邦本思想慢慢开始动摇，民为邦本思想慢慢萌芽，并且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。

《尚书·五子之歌》曰：“皇祖有训：民可近，不可下。民惟邦本，本固邦宁。”夏禹训诫臣属：老百姓可以接近，但不能失去自己的身架。老百姓是国家的基础，基础稳固了，国家才能安定。尽管把“民惟邦本”挂在夏禹名下不符合事实，但从夏禹时起，人民的力量确实开始显现。《吕氏春秋·国民》载：“禹之时，天下万国，至于汤，而三千余国。”《汉书·贾山传》载：“昔者周，盖千八百国。”周平王被迫东迁后，“春秋之中，弑君三十六，亡国五十二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，不可胜数。”（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）至战国时期，华夏大地仅剩“七雄”。经过两百多年的争战，由秦统一了中国。由夏到秦是一个“社稷无常奉，君臣无常位”（《左传》昭公三十二年）的社会大变动时期。为了进行战争，统治阶级残酷地压榨平民；战争使大量民众伤亡，出现了“民三其力，二入于公，而衣食其一”、“国之诸市，屡贱踊贵”（《左传》昭公三年）的惨状，逼使奴隶和平民起义“滔滔者天下皆是”（《微子》）。人民的伟大力量，愈来愈明显地表现出来。各派思想家都重视对“民”的研究，“民惟邦本”慢慢成为他们的共识。《管子》曰：“政之所兴，在顺民心；政之所废，在逆民心。”（《牧民》）《左传》曰：“夫民，神之主也，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。”（桓公六年）又曰：“国将兴，听于民；将亡，听于神。神聪明正直而一者也，依人而行。”（庄公三十二年）《老子》曰：“贵以贱为本，高以下为基。”《墨子》主张“爱利万民”（《兼爱下》），特别重视“农与工肆之人”（《尚贤上》）。《韩非子》曰：“无地无民，尧舜不能为王，三代不能以强”，故“先王尽力于亲民”（《饰邪》）。《吕氏春秋》曰：“安危荣辱之本在于主，主之本在于宗庙，宗庙之本在于民。”（《务本》）可见，重民已成为各派思想家的共识，其杰出代表就是孔子和孟子。

生活在社会大变动中的孔子，对人民力量的伟大已有相当深刻的认识。他的一系列论述，构成中国民本思想体系的雏形。如他对鲁哀公说：“丘闻之，君者，舟也；庶人者，水也。水则载舟，水则覆舟。”（《荀子·哀公》引）据《孔子集语·易者》记载：子曰：“商，汝知君之为君乎？”子夏曰：“鱼失水则死，水失鱼犹为水也。”子曰：“商知之矣。”这就说明，在孔子看来，君与民的关系，应该是鱼与水的关系。从民可立君亦可废君、君民关系应是鱼水关系的思想出发，孔子主张“重民”。首先，要尊重人格。他说：“三军可夺帅也，匹夫不可夺志也。”（《子罕》）孔门认为“四海之内皆兄弟也。”（《颜渊》）尊重人格，必须做到“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”（《雍也》）；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（《颜渊》）。其次，要爱护人。孔子思想的核心是“仁”，仁就是“爱人”（同上）。上述“匹夫”、“四海之内”的人（包括奴隶），都是爱的对象。《乡党》中说：“厩焚。子退朝。曰：‘伤人乎？’不问马。”体现了孔子爱护奴隶的思想。第三，对民要富而后教。孔子引用尧曰：“四海困穷，天禄永终。”（《尧曰》）为了保住天下，统治者必须让庶民“富之”（《子路》），做到“百姓足”（《颜渊》）。为此，必须“节用而爱人，使民以时”（《学而》），“因民之所利而利之”（《尧曰》）。在富民的基础上再“教之”（《子路》），做到“有教无类”（《卫灵公》）。孔子倡行民本思想的根本目的，是要建设一个“老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少者怀之”（《公冶长》）的理想社会。

[第 1 页]

[[第 2 页](#)]

[[第 3 页](#)]

[[第 4 页](#)]

[[第 5 页](#)]

[[关闭窗口](#)]